

台灣中東歐學的耕耘者 ——洪茂雄教授的學識之路

杜子信

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中東歐研究在國內的學術領域中向來屬於冷門學科，在歷年出版的各大重要研究歐美的學術期刊及出版品之中，探討中東歐領域的專文可謂屈指可數，然而中東歐各國與吾國台灣自二戰後的發展，實有著許多類似之處，尤其自中東歐非共化以後，各國政府對於民主化的進程及轉型正義的推動等經驗，可資吾國借鏡之處甚多，因而深入觀察中東歐各國政、經、社各方面的發展，誠屬必要之舉。洪茂雄教授自 30 餘年前，已然基於中東歐人民抗暴的行動中而深感研究極權政權本質的必要性，因而自歸國之後，窮其精力於中東歐各國的研究，迄今發表出版有關中東歐領域的專書及論文百餘篇以上，實可稱為吾國中東歐學的創建者。本文旨在探討洪茂雄教授投身於中東歐研究的心路歷程的發展，為充分了解洪教授關注中東歐課題之所由，行文之初有必要略闡述其艱困的成長求學、思想的啓蒙及留德時期的世事衝擊等背景，其後則以洪教授畢身專研中東歐領域的三大主軸：東歐概念的意涵及 1989 東歐共產體制的瓦解、兩德再統一後所衍生的相關課題，以及中東歐民主化後的各國政經體制的轉型及困境等為題而進行探討，闡明洪茂雄教授作為台灣中東歐學奠基者的學識建構歷程。

關鍵詞：洪茂雄、中東歐、東歐、中東歐非共化、兩德再統一

壹、緣起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眾裏他尋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王國維《人間詞話》

百年之前，王國維先生回顧其畢身朝夕念之、夙夜匪懈地執著於重整經典文集而行教化人心之舉時，頓而參悟出上述文句，並以之作爲其一世之註腳。這段平凡之中寓含深意的詞彙亦貼切且真實地形容洪茂雄教授的人生：由貧困年少之時的艱辛逆境，千錘百鍊之中淬煉出勇往前行的力量及對終極目標的堅持不移，並爲完成其人生目標，幾乎鎮日埋首書海，廢寢忘食，卻不改其志，終在學術上，尤其是中東歐研究領域成其一家之言的地位後，投身於推動台灣主體意識及教化士林的大業之中。

上述感受在與洪教授互動十數年以來，一點一滴沁入我心，其間歷程卻非經由其諄諄教導或剴切陳詞所領略，反倒是平淡互動之中而心若有感，其後經多年來的點滴累積，逐步領悟到洪教授靜水深淵的博學基礎及其堅持的理想，總在平日生活的閒話家常之際自然流露。與洪教授初識於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的碩士論文評審之期，猶記當時洪教授針對本人論文的內容，提出若干一針見血的疑問及發人深省的觀點時，本人頓時陷入所學不足的窘境而難以回應；然而洪教授不疾不徐地引導我去開啓另一觀察視野而並不直接回答我答案，事實上直至論文定稿發表爲止，內文修正之處極微，但我卻在留德多年之後，方才逐步發現其中問題之所在，並漸次領會當初洪教授之深意，從中更由衷感念他提攜青年學子的啓蒙方式與用心。其後本人踏上與洪教授相同的留學德國之路，埋首浩瀚典籍之餘，洪教授的治學理念、啓發式學習的作法，以及竭盡心力於廣植吾國台灣主體意識的精神，總在有形無形之間影響著我。及至學成歸國後，驀然發現對於人生的態度及心繫本土的情懷早已潛移默化而成爲內心最深沈動力之所

在，是洪教授人格特質具體影響我心，亦或是心中服膺之餘而以之為自身行事準則，已無由分辨之，所關注者唯在於與洪教授是師亦父的情感中，為吾國學術界及為吾國前程為己所當為，行己所當行。心有所感，發諸心，形之文，擬借本文來發抒縈繞心中十數年來的感想，一窺這位台灣中東歐學的耕耘者及創建者——洪茂雄博士的學識歷程。

貳、早歲已歷世事艱——成長背景

洪教授於 1940 年出生於嘉義縣東石鄉圍潭村，該地為一典型台灣西海岸的小漁村，居民大多以養蚵或務農為生，洪教授的父母亦是以之謀生，其先天環境及生活條件的拮据自不待言，由於洪教授父母育有子女 12 人，在所得微薄的狀況下，欲維繫一家 14 口的生計，自始至終就是一極為艱辛的歷程。然而先天的逆境畢竟無法阻撓一家之主欲將嗷嗷待哺中的孩童拉拔長大的決心，尤其最令洪教授終生感念並時時為之心生孺慕追思之情的母親，其一生艱辛的奮鬥歷程至今總令洪教授追撫不已。洪女士是一位堅毅卓絕、百折不撓的典型台灣農村婦女，她在丈夫離家及洪教授尚處於稚齡之期時，毅然一肩扛起單獨養育 12 名子女的重責大任。為求學家幼兒的溫飽，洪女士不眠不休、夜以繼日的辛勤工作，對一名日日為生活壓力所迫的孤苦女子而言，其間的辛酸歷程不問可知，不惟如此，洪女士對於子女的教育大計亦不稍有輕忽，在其堅持下，洪教授的手足因之皆受到良好的基本教育，歷經含辛茹苦十數年，終將子女栽培成人。切身經歷這段由稚齡以迄青年的艱辛成長歲月之歷程，至今洪教授每每思及其母剛強兼慈愛的身影，仍不勝唏噓。

深深感受母親的辛勤養育及維繫沉重家計之不易，致使洪教授自幼時起即已呈現遠較同輩孩童通曉人世的早熟，每日兢兢業業於學業的汲取而不敢稍有懈怠，深盼能在未來一展鴻鵠遠志，以報母親栽培養育之恩。在強烈的自我要求期許下，洪教授自小學開始即已展現優異的成績，隨後一

路高分考取初中、高中，並終而順利考取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此後這段歷時數年的大專時光，在洪教授廣閱群籍及當時社會氛圍變化之雙重影響下，漸次啓發洪教授對學術自由的渴望及政治理想的憧憬，這段時期可謂之為觸發其日後何以勤奮著書立述以闡揚台灣主體意識的關鍵期。

參、年少承啓正義心——思想啓蒙

甫入大專院校的洪教授，對於系上課業仍秉持其一貫的認真勤學為念，然其初學之期適逢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期台灣自由主義人士呼籲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自由化的年代，這些學者如陶百川、胡秋原、蔣勻田、沈雲龍、夏道平等，將其自由理念或透過世新專校及其他大專學府的講堂內，或透過一系列雜誌書籍的發表而呼籲中國國民黨當局進行政治改革，解除戒嚴法並全面實施自由選舉，廣納所有族群的政治菁英於政府體系，以挽救當時正處於風雨飄搖的台灣國際處境。這股風潮的直接波及下，對於時為熱血青年的洪教授而言，無疑對其思想激起極大震撼。由於往昔在黨國教育的封閉體系中，洪教授一如當時大多數青年學子般，對於民主自由的精髓真義係處於矇矓未知的蒼白狀態，甚至在昔日經歷過 228 及白色恐怖陰霾的眾多長輩嚴厲的叮嚀囑咐下，對於政治改革及學術自由完全採取著疏離敬遠的態度。因此一俟前述自由大師剴切陳言之後，頓而激發洪教授對體制現狀的關注，於是世新求學期間，洪教授潛心博覽當時敢於抨擊時政的時事雜誌諸如〈文星雜誌〉及〈中國知識分子〉等等，其中尤以雷震所編輯發行的〈自由中國〉對洪教授批判思維的養成影響甚鉅，藉由該雜誌對於時政的諸多針砭，大幅開拓他的政治視野及所學何為的想法，同時建立起批判的思維及善惡分明的正義感。尤為難能可貴的是，洪教授在大專求學期間因在學成績優異而曾獲中國國民黨頒發三民主義獎學金，當時洪教授的優異表現令國民黨為之賞識不已，因而透過大專軍訓處積極爭取其入黨，然洪教授完全不為所動，尤其他在明瞭國民黨政權的真

正統治本質之後，本著良知的呼喚，愈發感受到無法將自身所學專長貢獻予國民黨黨國體制，同時並暗下決心自今而後與國民黨分道揚鑣。

此後數年的歲月中，洪教授潛心思索國家政局未來的可能走向及其自身能為之作出何種貢獻，幾經摸索，洪教授漸次瞭解到，以自身微薄之力及所知尚淺的條件下，唯有多所學習他人之長，應可提供日後吾國政經社變革時之所需。基於此種以先進文明為師的想法，洪教授遂全心理首於國際事務之鑽研，並在修習國際關係及歐美文化等學科的過程中，愈發欣賞歐美社會所蘊藏的深厚文化根基及由之蘊育形塑的民主自由制度，在醉心於西洋文明的諸多優點之際，內心常懷憂國家前途走向的洪教授，因此不斷思索歐洲文明發展之過往可對吾國台灣的未來發展提供何種借鏡，然而若欲細心觀察歐陸社會發展之脈動，非有經年數載的身處其中不為功，因而也誘發洪教授心生出國深造之思。在諸多歐美國家之中，洪教授最終決定以德國（西德）為其未來留學國度，其首要考量除在於德國大學學制免學費，可大幅減輕自身經濟負擔之外，德國人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及謹慎細密的行事風格，與洪教授自律嚴謹及細心求證的性格甚為契合，於是日後留德的目標遂就此底定。心意既決，洪教授在大專期間即竭盡所能地多所增益相關各類學科之知識，俾強化課堂上所學之不足，同時藉此因應日後留學的繁重課業壓力的挑戰。

肆、去國懷鄉十萬里——負笈歐陸

世新專校行將畢業之際，洪教授卻陷入為籌備出國留學的經費之苦，他非常明瞭以原生家庭的經濟情況而論，具體供應出國留學的經費絕無可能，洪教授自身更不願增添家中無謂負擔。然為達成其留學德國的願望，心中早已下定決心，未來留學生涯將以半工半讀方式來維繫日常生活之開銷。即令如此，眼下出國的單程交通費用之籌措已是一大難，為求將旅費開支降至最低，洪教授決意捨卻價昂的飛航而取道須飄泊大洋月餘之久的

海運行程，然以其當日拮据的經濟狀況，仍無法湊足一張遠程船票所需之費用，此刻幸賴班上同學及時施以援手方使困難有解，在當時班上許多同學的慷慨解囊、小筆金額的贊助之下，終而順利籌措到足供購買一張遠程船票的金額。正是所謂自助助人，這一切多少亦歸因於洪教授平日在班上勇於任事且熱心助人，使其與同學間的關係建立起異常堅實的信賴感，因此洪教授此刻面臨困難之際，同儕間毫不遲疑地伸出援手，助其度過眼前難題，於是洪教授最後終在滿懷感恩同窗盛情的激動下登上甲板，航向滿載未來希望之所繫的歐陸之行。

即使有著同窗的盛情襄助，然在扣除船票及航程上的必要開銷之後，行抵德國漢堡港時，全身上下竟僅餘 60 美元，然而滿心期許能沈浸於德國紮實學術環境薰陶並從中鑽研其學術精髓的洪教授，對於未來數年，甚或可能逾越十年之久的辛勤工讀生涯，似早已了然於胸，或許已然經歷早歲時期的艱難，困頓環境反倒激發起其勇往直前的動力。於是毅然搭車前往其最初所申請的大學註冊，展開其後長達 11 年之久的留德逐夢之旅。洪教授於 1967 年抵達德國之時，原就讀位於德國西北部的閔斯特大學（Westfälische Wilhelms-Universität Münster），並以昔日在世新專校時所就主修的大眾傳播系為其專攻領域。然而就學於閔斯特未及一載，卻因隔年發生的一件震撼全歐的事件，不意改變了日後洪教授學術研究方向，此即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緣於當時捷克斯洛伐克新任共黨總書記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在強大民意的壓力下，決心拋棄僵化的共產黨教條主義而採行較具人性化、自由化及民族化的溫和改良式社會主義。此舉觸怒了以蘇聯為首的華沙集團國家的不滿，為免這股自由化的風潮波及華約其他國家，進而危及整個東歐集團的政權穩固，蘇聯及華沙集團國家決心出兵捷克，以示倣尤。於是在 1968 年 8 月 21 日，蘇聯軍隊連同其所掌控的華沙集團國家部隊開進捷京布拉格，大舉鎮壓捷克人民爭取自由的訴求，在蘇聯高壓整肅下，這場捷克自由化運動最終以血腥的悲劇而收場（李邁先，1991：427-32）。此一發生於緊臨德國（西德）之旁的捷克

人民爭取自由事件，對於內心早已奉民主自由為圭臬的洪教授而言，心中的震撼不可言喻。尤其此前不久洪教授仍在國內體驗過中國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緊張氛圍，此際又在歐陸看到類似的極權政體對訴求和平改革的民眾施行國家暴力，凜然讓洪教授立定志向，決心對極權政體的統治本質作深入研究，深究其何以國名率皆以人民或民主共和國為名，實則對內施行一黨專政，獨攬一切政經社大權，對人民則極盡所能地厲行全面控制之舉。亦正因當時德國地處東西冷戰的前哨地位，對於東歐集團的研究方興未艾，各大檔案局中有關各共產政權之檔案文獻汗牛充棟。甫受布拉格之春事件衝擊的洪教授，自此決心運用德國豐沛的學術研究成果及地緣毗鄰的地利之便，全心投入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領域。

盱衡當時德國各大學之研究重點，位於德國東南部的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向以研究中東歐學而聞名全德及全歐，若欲窮究中東歐學的精髓要旨，慕尼黑大學實為不貳首選，因此洪教授旋即向該校提出申請並自 1968 年夏季轉至該校就讀，正式展開其研究中東歐領域的生涯。甫入慕尼黑大學未久，洪教授由課程要求之多及課業壓力之大即已深刻感受到該校在中東歐學的傳統權威性地位，誠然在該校就學過程之中，無時無刻莫不感受到學業壓力迫人之重，然而在其沈著堅毅應對的歷程中，一絲不苟的德式學術研究方法亦在其間深深內化於洪教授的治學態度之上，日後其之所以能夠在中東歐研究領域提出個人卓見並開拓出一片新天地，慕尼黑大學十年的紮實學術訓練，厥為其間關鍵基礎之所在。

於此同時由於慕尼黑地處西方民主國家毗鄰東歐集團的前緣地帶，對於洪教授而言，此種地緣之便漸次觸發其欲一窺東歐共產國家的誘因，因為此舉不僅可藉由實地對之的觀察而印證其所學，同時亦因其同屬於專制國家的背景，親身體驗同樣滿佈肅殺的政治氛圍，格外感受到對自由人權的渴望是不分國界及人種的。因此自從成為慕尼黑大學博士班研究生之後，洪教授曾數度進入東歐集團社會主義國家，從事學術及進行實地觀察

之旅，這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不僅首開國人進入鐵幕國家之先鋒，甚且可謂為大膽冒險之舉，因當時台灣的國際地位不受中東歐各國的承認，以致行旅於當地，台灣公民的人身安全幾乎毫無保障可言，復因布拉格之春事件甫落幕未久，整個東歐集團國家仍處於風聲鶴唳之局，街頭軍警崗哨遍佈，處處皆有朝不保夕及人人自危之感，尤其有別於在地民眾的東方人士行走其間更易成為軍警監視盤問之對象。此種不利的外在因素，猶未能阻卻洪教授欲深入觀察探索中東歐地各國的決心。總計就學於慕尼黑大學十年期間，洪教授的足跡遍及了捷克、斯洛伐克、東德、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前南斯拉夫等等，尤其先後曾在 1956 年及 1968 年發生人民抗暴的匈牙利及捷克兩國，更由心底觸動洪教授前往憑弔之心，方當其親臨民眾遭受鎮壓的現場，不覺駐足其間良久，設身處地去體會昔日兩國人民為追求自由而進行徒手抗暴的悲壯。此種身歷其境地體驗東歐集團國家的社會發展狀況，予其日後之研究影響甚大，其中東歐各國之相關的著作論述皆可從其數次的中東歐之行得到實際的引證，從而使其論點得到堅實有力的立論依據。

洪教授一方面不僅平日廢寢忘食地埋首於中東歐學的研究，他方面亦須為維繫其日常生計而籌措生活開支，因而唯有以工讀方式掙取維生所需的費用，尤其在其維繫最低生活消費之餘，尚須儲存必要學術之行的開支所需，就像前述所提中東歐之行的旅費，完全端賴他於餐廳辛勤打工所得的微薄收入省吃儉用而來，不難想像其留德求學生涯可謂艱辛異常。幸賴其經歷早年困苦歲月的操磨，身體狀況尚能承受煩重學業及工作的雙重負荷。然而猶似命運之神欲繼續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進而增益其所不能般，眼見洪教授留學生涯於艱辛之中猶能漸入坦途之際，竟不意在此刻染上一種極為罕見的後天性眼疾，患者的視力將隨時間而逐步退化，最終則退化至半盲狀態，時至今日全球醫學界仍對之束手無策，當時醫生告知洪教授此種眼疾藥石罔然，現有醫療技術唯能做者，僅能投藥盡可能延緩視力的惡化，同時並取決於患者自身的健康而定。乍聞此一惡訊的洪教授，猶若

晴天霹靂，久久難以回神，心中反覆閃過的是無數的爲什麼，何以命運之神要如此安排。篤信天主教的洪教授轉而祈求天主之恩以療心靈之創，經歷數日震盪之後，終使其心境逐漸復歸平靜，他寧信此種折磨爲對其心志的磨練，旨在堅忍其志以使其學術研究的精髓一如其此生艱困歷程般，達到據實寫真及擊劃深刻的境界。

即令勇於面對命運之神的安排，視力的逐步惡化仍使洪教授的學術研究之路倍感艱辛，由於必須遠較先前耗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而進行文獻資料的閱讀，反使已患有眼疾的雙眼更增負擔，這段期間雖知眼疾之症恐難以治癒，然爲盡可能保持現有視力於不墜，俾因應日後學術生涯之各項挑戰，在洪夫人未曾間斷地探詢良醫及處方下，洪教授仍四處尋求改善其視力的可能性，然視力弱化問題迄未改善。洪教授於是漸形淡化視力重現昔日光明之念，轉而希望依現今儘管吃力、然尚能依賴己力閱讀的狀況下，儘可能在兩三年之期完成自己的博士學程。其後學業進展幾乎一如其所擬定的時程般，博士論文完成之期已悄然在望。此時突獲好友告知，國內有一位擅長針灸之術的醫生，聽聞友人轉述的洪教授特殊眼疾的症狀後，頗有把握的告知有改善洪教授視力的療程，洪教授在幾經思量後，決心回國一試傳統漢醫的療方，內心仍期待藉由針灸點穴之方或能改善視力狀況亦未可知。殊不料此次療程不僅未能改善其視力痼疾，甚至因針灸用針消毒不全，使洪教授在未知的狀態下染上 B 型肝炎，幾乎造成其後無可挽回之局。由於當時針灸療程仍未能改善其視力之後，洪教授無奈返抵德國，希望儘速完成論文最後章節，因而在極短的時間內，朝夕殫思竭慮地投注於論文的完稿，與昔日有異的是，在其留德最末一年之期，不時感到身體極度倦怠與無力，原以爲是趕交論文所導致的疲勞之故，遂不以爲意，最終在其堅韌毅力的堅持之下，順利如期將其論文呈繳校方。然而在呈繳論文之後，其身體疲憊狀況並未因充分休息而改善，甚至出現更形惡化的現象，因而就在論文繳交後的一週後前往醫院進行健康檢查，診斷結果，證實洪教授因日夜操勞之故，導致其體內 B 型肝炎病毒轉化併發出猛爆型肝炎，

其病況甚為危急，甚且危及其生命，院方迅速安排洪教授住院治療休養，然而對於此種急症，並無速療之方，一切僅能令其在院靜養及徹底休息。人生再一次橫遭劇烈衝擊，所依憑者仍是強大的使命感及堅忍的意志力，終能使洪教授從瀕臨危急狀態而緩步走向穩定之境，走過這段為維繫其生命的搏鬥歷程，更讓其領悟到在其有限生命之中，當盡一己之力將其長久以來所知所學奉獻於國內學術界，並進而宣揚從其研究中東歐各國的案例之中所衍生出的政治改革及台灣國家意識的理念。

伍、為誰無盡寫江天——盡瘁所能

1980年洪教授終在完成歷時長達11年之久的留德生涯後歸返國內，隨即應世新專校之力邀而回母校任教。他在母校席未暇暖，適逢當時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徵聘研究員，基於適所專才及欲藉該機構將已然卓有心得的中東歐研究向國內學界推廣之心，因而轉任政大國關中心，擔任研究員一職，正式展開其著述立書的學術研究生涯。

進入國關中心之後，洪教授著其畢生心力於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課題的研究上，試圖從中歸納出可供吾國未來發展的經驗或引以為鑑的案例。這段期間，即令其視力已逐步弱化至必須徵聘特別助理來為其進行資料篩選事宜，然卻絲毫不影響其撰文投稿的積極態度，總計洪教授任職於政大國關中心的20餘載期間，繳出極為可觀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16次的國科會計劃案、數十篇刊載於《問題與研究》、《歐美研究》等重要期刊的論文，以及數部專業著作等等，其著作成果之豐碩在當時國關中心內係位居數一數二的地位，亦因其工作表現極度優異之故，因而能從副研究員、研究員，最後高升至該機構第一所所長之職，同時隨著其學術聲望日隆，淡江及南華兩所大學的歐洲研究所先後爭相徵聘洪教授為所上專任教授，希望藉由其專業素養，全面提升研究所水準。因緣際會下，使得洪教授不僅能與眾多研究生建立起密切的師生互動關係，學生們更得以藉由課堂上的

聽聆而領會洪教授的豐富學養，進而在日後造就許多傑出優秀的國際事務人才，服務於學術界及外交領域之中。

任職國關中心的數十年之期，可謂洪教授畢身所學精萃的發揚光大時刻，自從「布拉格之春」事件激發其由觀察東歐集團國家的政治變化，來反思台灣政治前途走向的想法之後，中東歐國家的政經發展脈絡成其鑽研之重點，因而洪教授各類發表成果之論述主軸幾全聚焦於中東歐研究的領域上，對於台灣學術界的中東歐學的建構與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因此以下本文欲由洪教授歷年所發表的著作，一窺其研究內容的精髓要旨。綜觀洪教授的中東歐研究的各類發表文獻，約可細分為三大領域：東歐概念的意涵及 1989 年的東歐共產體制的瓦解、兩德再統一後的相關課題，以及中東歐民主化後的各國政經體制的轉型及困境，以下分述之(Conze, 1992: 1-3)。¹

就第一項領域言之，1984 年發表於政大國關中心所屬期刊〈問題與研究〉的一篇論文「東歐研究之趨勢與現況」為洪教授早期代表作(洪茂雄，1984：97-107)，該文已然將其對中東歐研究的基本概念、本質及意義，

¹ 筆者按，「中東歐」(Eastern Central Europe / Ostmitteleuropa) 的概念正式形成於一戰結束後，隨著德意志第二帝國、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及俄羅斯帝國的戰敗，根據『凡爾賽條約』的相關規定，戰勝國在德俄之間建立許多新興的國家，係因法國希望在德俄之間建立起一股抗衡力量，因此法國統稱這些新興國家所處的地區為「防疫地帶」(cordon sanitaire)，德國則以上述新興諸國夾處於德俄之間的位置而喚其為「夾層歐洲」(Zwischeneuropa)，因而出現「東半部的中歐」，即「中東歐」的專有地理名詞。然二戰爆發後，隨著納粹德軍的東進及其後蘇聯紅軍的向西擴張，中東歐的地理概念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東歐」政治概念的出現，因為二戰結束後，蘇聯將整片中東歐地區納入其勢力範圍，與西方進行長期的冷戰對抗。直至 1989 年東歐共產集團崩解之後，中東歐的地理概念重新出現。根據現行歐洲地理區域的劃分，中東歐地區係處於德奧以東及白俄烏克蘭以西之間的地帶，計有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及科索沃等 17 個國家。本文使用現在歐美學界重新確定並廣泛運用的「中東歐」的地理概念，與洪教授原先所使用的「東歐」概念除了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及中亞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外，大致相同。必須說明的是，洪教授針對這個領域研究的時期跨越了冷戰前後，因而當時以政治角度而稱「東歐」實屬自然之理，與本文以地理概念出發而使用的「中東歐」並無矛盾之處，當然本文在援引洪教授文獻著作之時，仍使用其原有用法，特此說明。

作了綱要性的探討，洪教授對中東歐地區及各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精萃，大抵可由此文一探初微。依其觀點，「東歐」(Eastern Europe/Osteuropa)一詞具有多重面向的意義。就地理位置而言，所指涉者係指歐洲的東部，北起波羅的海，南至亞德里亞海，西抵喀爾巴阡山，東迄烏拉山及裏海。就政治層面而言，是指二戰結束之後，在蘇聯的卵翼下該區先後成立 8 個共產附庸國家，成爲一個政治集團，但因蘇聯所控制的共產附庸國尚包括其它非東歐地區的國家，如外蒙、越南、古巴等，因此所謂東歐集團又與「東方集團」(Eastbloc/Ostblock)及「蘇聯集團」(Sovietbloc/Sowjetblock)的意義相同。就學術地位而言，爲了抗拒當時蘇聯共產勢力的擴張與威脅，因而歐美各國不得不採行因應之道，因而在各大學廣設「東歐學」(Ostkunde)，或「東歐研究」(Osteuropaforschung)等專門學科，設有專門的學術研究機構。詮釋所謂「東歐」的定義之後，洪教授進一步說明該地區隸屬地緣政治的心臟地區，使得該地區頓成各界關注的焦點所在，英國地理學者麥金德在 1904 年時即已提出「心臟地帶」的地緣政治學理論，認爲歐、亞、非爲世界島，東歐至中亞爲世界島的心臟地帶，因此誰統治東歐，即能控制心臟地帶及世界島，進而主宰全球。一戰結束後，德國學者對於地緣政治學發展出所謂的「慕尼黑學派」，代表人物爲毛爾 (Otto Maull) 及豪士賀夫 (Karl Haushofer)，他們認爲地緣政治之中心概念著重於「生存空間」(Lebensraum) 與國家發展的關係，並將國家概念與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說」引用於德國，建構出「德國地緣政治」的理論。該理論之要旨爲，一個強大完整的陸權國家，具有難以攻陷的內陸交通網、自給自足的經濟，以及有力的軍事組織，將可構成大陸霸權的核心；至於環繞其周遭之小附庸國，則可組成供應與服務的貯藏地，俾供統治民族的使用。豪士賀夫的「德國地緣政治」理論，成爲後來希特勒 (Adolf Hitler) 及其國社黨人向外擴張的主要理論根據，儘管其後其擴張野心遭到遏阻，但麥金德的東歐心臟說及地緣政治理論仍深深影響著史達林 (Josif Stalin)，蘇聯利用二戰末期向西擴張而將整片東歐地區納入其掌控之下，

企圖以此為基礎而發動世界革命（洪茂雄，1984：98-99）。藉由這篇論文的發表，洪教授精要地點出東歐研究的入門基礎，提供台灣學術界及外交領域對於研究東歐地區的一項初步的認識。

1989年東歐共產體制的瓦解，震撼全球政局，此一劃時代的鉅變促使洪教授深入鑽研其因果始末，先後於隔年完成國科會計劃〈東歐國家民主化之比較〉（洪茂雄，1990）及其代表著《東歐變貌》（洪茂雄，1991）。兩文旨在剖析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歷經40餘年共產主義的統治，表面看來在共黨一黨專政的嚴密控制之下，似乎固若金湯，然而效率不彰的計劃經濟體制、共產黨「官僚體系」特權橫行，加以貪污腐化遍及各級政府，使得經濟改革最後以失敗作收，從而引發強烈民怨，在國家財政幾乎破產及社會急劇動盪所引發的政治危機的背景下，終而導致東歐各國共黨政權的先後垮台。洪教授同時藉由東歐各國民主化進程的比較，分析各共黨政權權力和平轉移的模式及彼此間的差異性，並對各國政局未來可能走向進行詳實的分析。由今觀之，洪教授在這兩部專文所分析預測的東歐各國政經發展將逐步步向穩定的形勢，幾乎貼近實情，其投注研究心力之深可見一端。最重要的是，洪教授透過昔日東歐的自由化運動，例如1953年東德工潮、1956年匈牙利抗暴、1968年布拉格之春及1981波蘭團結工聯遭鎮壓等案例均獲得平反的事實（洪茂雄，1990：65），來說明轉型正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希望藉此提醒國人反思專制威權統治之害及後續應進行的政治訴訟及司法救濟等措施。

其次在兩德再統一的課題方面，1992年洪教授先後發表國科會計劃〈從德國統一看「條約政策」之運作〉（洪茂雄，1992a）及國統會委托研究計劃〈德國和平統一的基礎：務實和理性的條約關係〉（洪茂雄，1992b）的結案報告；兩報告皆以1972年的「東西德關係基礎條約」簽署後，展開了後續條約政策的推行，並以一系列條約的締訂而營造雙方務實互動的基礎，以及其對東西兩大陣營及歐洲局勢的影響，最終在1989年東歐局勢急劇變化之中，兩德間條約政策的穩定運作不經意間也造成了兩德再統一

的契機。誠然兩德經由條約政策的運作而發展至再統一的結果，並必能夠盡行套用於世界其他地區的衝突案例，然而洪教授在全文之中所一再申言的，條約政策運作的核心關鍵在於，東西德雙方皆藉由明示（東德對西德）或默認（西德對東德）的方式而認可對方為主權國家的事實，有了這項核心要點作基礎之後，雙方才能進一步以人道主義及解決實際層面上的問題為考量，展開後續一系列的協商及締約行動，並能以條文規範來取代政治上的對抗和緊張的雙邊關係，即運用理性來解決問題，以談判來替代戰爭，進而在尋求均勢的過程中，盡可能找出不損及雙方利益的最佳平衡點（洪茂雄，1992a：112-13）。由東西德進行協商締約時所凸顯並為雙方所接受的核心關鍵，進而務實面對實際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洪教授觀點言之，實屬解決政治歧見的最佳之方。

兩德再統一之後所衍生的各種困境同樣亦為洪教授關注之焦點所在，在其於1994年所執行的國科會計劃〈兩德和平統一後之困局—變遷與因應〉（洪茂雄，1994）一文中，分析兩德再統一後的所造成的各項困境歸類為如下數因：首先當時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及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欠缺深思熟慮及萬全的準備，僅基於個人欲名留青史的心態，完全不顧東德沈痾難治的經濟狀況而迅速主導統一，使得再統一之後的兩方都付出極大的代價，不僅聯邦政府為此須負擔天價般的財政赤字，同時罷工、高失業率及新納粹主義的挑戰，令政府疲於奔命；於此同時前西德地區的民眾則極不滿於其為因應德東地區的重建而須繳納的高額賦稅，抱怨為此而降低原有生活水準；前東德地區人民同樣不滿，尤其大批民眾長期為失業所苦，失業率居高不下，導致社會秩序為之動盪不安，許多民眾因而衍生被出賣的情結，從而產生出嚴重的認同危機，因此洪教授推論，德國政、經、社的全面融合恐須等到21世紀初（洪茂雄，1994：105-106）。由今觀之，此種看法尚算保守，德國政界人士最近甚至直言，德西德東生活水準落差的全面弭平尚需一個世代左右，亦即約2030年之時。從中卻亦揭示出洪教授這篇解析兩德再統一的各層面困境的計

劃，是切中問題的要害，頗值得心憂國家前途之士深思。最後洪教授在文末的部分同時亦對我國與中國間的關係提出其看法，認定兩岸現行即為「兩個國家，兩個政府，兩套不同的制度」，台中雙方應以此為基礎，仿效歐洲聯盟整合的模式，藉由各個領域的條約關係，建立起「條約網的共同體」（洪茂雄，1994：107-108），促使雙方的生活水準經由自然的互動而逐步拉近，至於未來兩岸的終極關係則交由後代決定。

最後就東歐民主化後的各國政經體制的轉型及困境而論，1999 及 2000 年所發表的兩篇國科會計劃〈後共產主義時代東歐國家政經發展之研究：結論篇〉（洪茂雄，1999）及〈蘇聯解體後前加盟共和國共黨演變現狀〉（洪茂雄，2000）對於東歐國家在轉型為民主政體時所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境作了深入的分析，就其觀察各國差異性主要見諸於三項：其一，東歐前社會主義各國因在共黨統治時期所經歷的統治經驗不同，因而後共時期的民主化進展也出現相當的落差，例如先前已出現過自由化運動的波蘭、捷克、匈牙利三國，民主化進展較為順利，反觀昔日完全處於共黨高壓統治，毫無改革經驗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邁向民主化之路則顯得步履蹣跚。其二，與中西歐各國相毗鄰且互動頻繁的國家如波、匈、捷及斯洛文尼亞，宗教信仰與西歐相同，受西方文化影響亦較深，在這種地緣因素的激盪下，使上述各國民主改革穩健發展；反之，羅、保、阿等國因位處西歐邊陲，受西方文化影響不深，多少削弱其推動民主改革的動力。其三，東歐各國民主化的程度又與民族主義浪潮的強弱成反比，極端民族主義高漲的國家如塞爾維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那等因國內戰爭頻仍，使其民主化進程停滯不前，斯洛伐克亦因內部民族問題，民主化程度遠不如鄰國捷克；反之如前述之波、匈、捷三國因無民族問題之牽累，民主化進程可平順發展（洪茂雄，1999：175-77）。洪教授這兩篇計劃具體詮釋東歐共黨政權由專制體制邁向民主改革的歷程，亦即逐步朝向「歐洲化」，儘管其間或有程度不一的困境，然而這種和平演變，實為 20 世紀人類史之一大創舉，其重要性可與 1789 的法國大革命前後相互輝映，其提供了

日後極權主義或共產主義體制如何轉型變革的寶貴經驗（洪茂雄，1999：178），因而非常值得有識之士為之投注研究心力。

盡瘁所學所知於政大國關中心數十年的研究心血後，終而成功地建構出中東歐學在台灣學術界一席之地的地位，時至 2005 年，洪教授終於在成果斐然、名聞遐爾之際榮退，完成其階段性的任務。然而基於關心中東歐學在吾國的持續深化與廣化的使命感，退休之後的洪教授仍然勤奮筆耕不輟，鑑於昔日研究成果偏向於探討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共黨專政及非共化後的民主轉型的政經社問題，讀者及學生在拜讀之餘總生對各國歷史背景不足之歎，從而未能全然明瞭重大事件因何之所由及何以之所行，因而洪教授決心應三民書局國別史系列之邀而撰寫中東歐的國別史，先後於 2005、2008 及 2010 年完成《南斯拉夫史：巴爾幹國家的分與合》、《羅馬尼亞史：在列強夾縫中求發展的國家》、以及《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三部專著的撰寫，對於三個國家由古至今的歷史發展作一番概觀性的詮釋，大幅增綴中東歐研究領域的完整性。

持續戮力不輟於中東歐學的耕耘之餘，洪教授不忘以其研究專長投注於社會實踐大業上；除了應南華大學歐研所之請而受聘為講座教授，藉由講座課程繼續啓發學生對歐洲事務的興趣與喜好之外，尤其關注於如何以其所能對台灣國家意識的建構與傳播盡其心力，基於強烈信念使然，洪教授積極參與各支本土性社團的活動，親身力行於組織內的運作，構思擘劃各項計劃活動的制定與執行，且大力支持各種宣揚台灣意識的研討會及座談會，不僅時常親身與會聆聽，與與會學者多所交換意見，如遇有探討援引歐洲案例以為吾國現狀之借鏡的會議，他總不吝於提供自身數十年來的研究成果作為會議內容的有力論證，或是擔任與談人，直接與聽眾面對面詮釋中東歐各國的案例可予吾國何種啓示；於此同時洪教授對於本土各機構亦熱心捐輸，傾力貢獻一己之所能，資助本土社團繼續為台灣主體意識的深化與廣化而發聲。此種心力財力的雙重付出的目的僅在於，衷心期望國人認清國家現今所面臨的深層危機之所在，進而激發出堅定的台灣國家意識，齊心面對並審慎因應未來接踵而來的挑戰。

陸、後記

歷經幼年歲月的艱辛、求學階段的困窘及留德時期的憂勞，無形之中已形塑出洪教授處事應對時的沈穩及迎對逆境時的堅毅性格，因而對於既定目標的追求，始終秉持著鍥而不捨的態度，體現於其專攻領域——中東歐學之研究上，可謂深入竅要。自從「布拉格之春」事件的衝擊以來，洪教授即志向已定，欲深入鑽研中東歐各國共產政權的統治本質；究竟這類對外冠名人民或民主共和國，實則對內厲行一黨專政、箝制人民自由的極權體制，如何以其高壓威逼措施，嚴密控制社會動靜；然而總有為爭取自由而履仆履起的各國民眾無畏獨裁暴力，持續不斷挑戰共黨當局，終使看似牢不可破的專制藩籬在傾刻之際盡行瓦解。此一劃時代的巨變，對於洪教授而言，自青年以來心中所秉持的自由無價的信念，全然在 1989 年中東歐共產體制解體並步向民主化的事件中獲得見證。因而為之奮筆疾書，將中東歐共產集團國家由盛轉衰的歷程，透過其精闢之筆，詮釋中東歐各國民眾長期抗暴所展現的犧牲無畏之精神及百折不撓之毅力，並從中深刻體認出自由民主價值之可貴。

「瓊霞如楮水如牋，為誰無盡寫江天」，綜觀洪教授歷時數十年的筆耕不輟於中東歐相關研究著作的發表與刊行，用心實不難理解，其所秉持的終極理念有二：其一，中東歐國家與吾國台灣自戰後的發展有著太多雷同之處，因此如何汲取其中轉型正義成功之例以為吾國效仿之用，實為其念念在茲的心願，尤其眼見許多較之吾國更晚擺脫專制極權的中東歐國家，今日在自由信念的引領及對民主普世原則的重視下，轉型正義的過程運作順暢，昔日專制體制機構及官員對人民不當的作為，陸續皆受到司法追究及應有的制裁，使得各國皆能逐步且穩定地邁向「歐洲化」之途；反觀吾國，脫離威權統治至今已逾 20 餘載之久，然而許多威權時代當局者對人民不當的迫害行動，迄今並未得到應有的正視與制裁，使得轉型正義從未能具體落實，對吾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不免存在著重大缺憾。其二，自

二戰結束後，中東歐各國在蘇聯實質控制下淪為附庸國的地位，因而中東歐各國人民在爭取自由而抗暴的同時，實則亦在抵抗外來強權對其國之箝制，雖則初期橫遭蘇聯軍隊血腥鎮壓，然而中東歐各國民眾不畏犧牲，爭取國格的自主伴隨著爭取自由的行動互為表裏，緣時並進，終能在掌握契機，一舉在1989的中東歐變局中，不僅對內成功推翻國內共黨一黨專政，並進而徹底掙脫蘇聯的外來控制，國家主體性的地位終獲得鞏固；相較於中東歐各國，吾國從民主化以後，雖然政、經、社方面的發展已不再受到一黨專政的控制，台灣主體意識在此期間也日益增長，然而戒嚴遺毒猶存，主政者透過教育傳媒管道仍有意無意傳播錯誤的國家認同觀，復以大批在對岸經商人士的混淆誤導，使得台灣國家意識始終未能堅定地深植大部分台灣人民心中，此即是洪教授內心最深沈憂慮之所在，因此奮筆疾書於中東歐各國案例的宣揚，期使更多國人能夠明瞭中東歐民主化的意義，進而更形增強吾國主體性的信念。因此本文最後擬以一語來形容洪教授為完成台灣國家主體性建構之大業而忘我投入的身影與精神——人生奮勵終有期，不廢江河萬古流。

參考文獻

- Conze, Werner. 1992. *Ostmitteleuropa von der Spätantike bis zum 18. Jahrhundert*. München: Beck.
- 李邁先，1991。《東歐諸國史》，台北，三民。
- 洪茂雄，1984。〈「東歐研究」之趨勢與現狀〉《問題與研究》23卷5期，頁97-107。
- 洪茂雄，1990。《東歐國家民主化之比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洪茂雄，1991。《東歐變貌——劃時代的民主化變革》。台北：時報。
- 洪茂雄，1992a。《從德國統一看「條約政策」之運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洪茂雄，1992b。《德國和平統一的基礎：務實和理性的條約關係》國家統一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洪茂雄，1994。《兩德和平統一後之困局——變遷與因應》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洪茂雄，1999。《後共產主義時代東歐國家政經發展之研究：結論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NSC-88-2414-H-004-013）。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洪茂雄，2000。《蘇聯解體後前加盟共和國共黨演變現況》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計劃編號：NSC-89-2414-H-004-017）。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 洪茂雄，2005。《南斯拉夫史：巴爾幹國家的分與合》。台北：三民。
- 洪茂雄，2008。《羅馬尼亞史：在列強夾縫中求發展的國家》。台北：三民。
- 洪茂雄，2010。《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台北：三民。

The Founder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in Taiwan: Professor Mao-Hsiung Hung's Scholarly Development and Road

Tzu-Hsin T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Central Eastern Europe Studies has been under researched in Taiwan. The relevant studies have been scant in publication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at of Taiwan bear much similarity. Among others, those countries' experiences in promoting democratizatio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set example to Taiwa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into the development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Professor Mao-Hsiung Hung has devoted himself to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more than 30 years as in his eyes it is essential to investigate the essence of totalitarianism against which peopl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fough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development of Professor Hung's dedication to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y and how he came to Central Eastern Europe Studie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depict his hard time in his childhood and growing-up, thought enlightenment and the impact during his stay in Germany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study. Then this study goes further to analyze Professor Hung's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field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term Eastern Europe and the break-up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of 1989, the Reunification of two Germanies and the relevant issu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difficulties that Central Eastern countries encountered after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ll this expounds the process in which Professor Hung came to be the founder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in Taiwan.

Keywords: Mao-hsiung Hung, Central Eastern Europe, Eastern Europe, Decommunisation, German Reunification